

林希翎與學生右派

• 謝 泳

一 關於學生右派

1957年的反右運動，改變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習慣上認為，共有55萬知識份子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但準確的數字是552,877人；到1980年共改正了54萬餘人，餘下的5,000人則維持原案不改或仍需要甄別^①。這就是說，這場運動中的右派，絕大多數是被錯劃的。在未獲改正的知名右派中，人們常常提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林希翎，這些人雖未被改正，但多數以特殊方式（由統戰部和他們所屬的民主黨派出面，藉誕辰和忌日）恢復了名譽。然而，林希翎這位最有名的學生右派卻一直未獲改正。

在當年的右派中，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左翼知識份子、平民知識份子、學生右派。而真正具有思想資源和政治理想的，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在當年的右派中，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一、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羅隆基、儲安平為代表。這批人的特點是具有留學歐美的教育背景。其中多數人在1949年前中國的民主憲政運動中很活躍，當時多屬民盟和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職業以大學教授為主，年齡約在50-60歲左右。

二、左翼知識份子。以丁玲、馮雪峰為代表。特點是早年參加左翼革命活動，多數人是共產黨員，1949年後在文化部門中擔負主要責任。

三、平民知識份子。這部分人的教育背景、年齡結構、政治傾向相對複雜，他們構成了右派的多數。

四、學生右派。以林希翎、譚天榮為代表。當時正是在校讀書的大學生，多數人無黨派，年齡約在20-30歲左右。

在以上四種類型的右派中，真正具有思想資源和政治理想的，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左翼知識份子成為右派，有非常明顯的宗派因素。平民知識份子大多對現實不滿，好議論，有個性而得罪了自己的上級。這幾種右派中，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學生右派為我們留下不少思想遺產。

1957年，學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們以結社、演講、創辦刊物等方式參與政治活動。這些人當時大多是二十幾歲，正值思想活躍時期。與其他右派言論相比，當時大學生右派的言論較少情感色彩，他們直接從自己的生活處境判斷社會現狀，這一特點決定了學生右派言論的純潔性和超功利色彩。從年齡上說，學生右派比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年輕20歲左右，這個年齡差異使前者的思想狀況比後者要簡單得多，理由是學生右派的思想資源只有一種，即當時為意識形態所認可的思想。當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已失去了同人刊物和同人出版社，嚴格意義上的結社也不存在了，那麼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從哪裏獲得思想資源呢？

二 50年代的大學教育

一般來說，學生是從大學以及日後的留學經歷獲得思想資源的。1949年後，英美的教育思想最早受到批判。1950年前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差不多都經歷了「洗澡」運動。洗甚麼呢？就是洗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而具有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早年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自然成為思想改造運動的主要對象。就思想傾向而言，當時的大學教授多數屬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儘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40年代屬於中間偏左的，但都只表現在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激烈抗議上，就思想和言論而言，我們看不出他們和新時代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多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像張東蓀、楊人楩、儲安平等，在40年代對國共兩面都有很清晰的認識和評價，其中廣為人知的就是儲安平關於自由問題的「多少有無論」^②。我們可以說，思想改造運動無疑是新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第一次傷害。新時代一方面離不開他們，但又不信任他們。當時，大學裏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幾乎一無例外地公開發表告別自己過去的文章^③，只有極少數的人如陳寅恪、張東蓀沒有表態^④。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來說，當時的表態有多少是出於真誠，有多少是出於恐懼，一時不好說清，但從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周炳琳的經歷中，我們不難感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實在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難以承受。為了幫助周炳琳改造，北大黨組織有領導有計劃派人同他談話；經過張奚若、馬寅初等人，還有他女兒（共產黨員）的工作之後，周的態度才略有轉變。毛澤東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的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份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⑤由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緊接着思想改造運動之後，1952年又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結果使當時有自由教育傳統的大學如清華、浙江大學等元氣大傷。對此，竺可楨曾有這樣的看法：「這在浙大是一重大損失，回復到了30年前工業專門學校狀況。但為整個教育前途着想是一個進步……。」^⑥此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便失掉最後的精神家園，他們的思想被當局認為是錯誤甚至是反動的，他們必須放棄自己過往的教育背景來適應新的環境。而新時代的大學生，基本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他們的大學生活的。

1957年，學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們以結社、演講、創辦刊物等方式參與政治活動。與其他右派言論相比，當時大學生右派的言論較少情感色彩，他們直接從自己的生活處境判斷社會現狀，這一特點決定了學生右派言論的純潔性和超功利色彩。

三 林希翎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是陝北公學，這所大學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說中國多數大學都有舊傳統的話，那麼大概只有中國人民大學沒有，因為它完全是新時代的產物。

中國人民大學的師生，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都很活躍，尤以計劃統計系和工業經濟系最為著名。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吳景超、李景漢，是在院系調整時進入人民大學的，他們的思想肯定對年輕一代有影響。吳景超、李景漢都是右派，著名的右派葛佩琦、賀安、王德周也出在這裏，而林希翎當時是這所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

1935年，林希翎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以調幹生資格進入人大法律系讀書。林希翎是她第一次發表文藝評論時所用的筆名，來源於當時三位活躍的文藝評論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⑦。從這個筆名，大體可看出林希翎當時的思想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兩個來源：一是當時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主），二是當時的蘇聯文化。一位了解林希翎的人曾這樣回憶她^⑧：

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兩個來源：一是當時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主），二是當時的蘇聯文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她並非從一開始就有異端思想的。她的這一經歷，在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是有代表性的。

讀過的書：馬列原著，《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牛虻》，伏契克著《絞刑架下的報告》，還有報上刊上討論得熱火朝天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的故事》。崇敬的人，第一個是毛澤東，還有保爾·柯察金，為正義戰爭而獻身的女英雄卓婭、劉胡蘭……程海果說：她也喜歡干預生活的娜斯佳。

從這段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出年輕的林希翎並非從一開始就有異端思想的。在她獲取知識的最佳年齡時期，她的思想資源是很貧乏的，看不出有一點西方文化的影響。她的這一經歷，在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是有代表性的。

1957年，林希翎獨立思考了許多問題，也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她在認識上達到的高度，無法從她的教育背景推斷出來，因為當時的教育是不主張獨立思考的。林希翎之所以能超越她本人的教育局限，一方面有個人氣質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和她以下的經歷有關：

一、由於特殊的經歷（林希翎曾和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談戀愛），她有機會讀到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改變了她的許多看法。她曾說：「我看到這個秘密報告以後，才看穿了斯大林。」^⑨

二、林希翎讀的是法律專業。儘管當時的法學研究有很多局限，但相對其他人而言，林希翎還是較早具有法制觀念的，她亦能較早從制度層面來觀察社會問題。她曾說：「以黨代政，政治問題的存在，共產黨是執政黨，威信很大，實權都在共產黨手中。法律是形式主義，蘇聯憲法更虛偽，蘇聯有法制組織，實際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壞法制。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意志。」^⑩此外，她對肅反擴大化、對胡風問題都有很深刻的看法，而對新聞自由的分析也能抓住實質。她說：「新聞自由可以看出廣大人民需要自由，中國青年報也分兩

派：記者、學生，作家比較最敏感，現在大部分認為新聞自由不夠，我說一句氣話，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如一記者報導匈牙利事件說青年人喝醉了酒，參加遊行，難道幾十萬人都喝醉了嗎？」^⑩「現在人民代表大會有些不像話，民主是真正貫徹的嗎？瞪眼說瞎話。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但是看看實際情況，他的權力是不夠的，不相信你在生活中觀察觀察，是黨代替一切，以黨代政，明明是客觀存在，何必閉眼不看呢？」^⑪

三、林希翎曾在河北石家莊、甘肅玉門進行司法實習，接觸過大量案件和訪問過許多人，比較了解下情。

四、林希翎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過交往。1957年，她和譚揚吾有過接觸。譚早年畢業於北大政治系，曾做過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思想基本是自由主義一脈，1957年也被劃為右派。林希翎在北京東四區人民檢察院實習時，曾受過譚的影響。

林希翎的這些經歷決定了她的思想資源比同時代的學生右派要豐富一些，從而也獲得了一定的深度。在1957年，一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能表現出這樣的思想鋒芒確實很不容易，因為她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成長的。對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而言，1957年的言論只是他們過去思想的自然發展而已，比之於40年代的言論，似乎並未提供甚麼更新的東西；但對於在封閉環境中成長的林希翎來說，她表現出的衝破單一思想模式的勇氣和能力，是學生右派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儘管她的思想不大成熟甚至有些混亂，在分析具體問題時的感慨性言論明顯多於理性思考，但她在封閉社會中追求真理的勇氣無疑是值得敬佩的，當時就有同輩學生認為她是「中國少有的勇敢、堅毅、剛強的女性」^⑫。正是因為有了林希翎這樣年輕的大學生右派，才多少讓人看到自由主義傳統的餘脈。默爾戈德 (Goldman Merle) 認為^⑬：

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在該政權下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份子和學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不管是通過蘇聯的渠道或者是通過他們前輩的著作，他們仍然繼續了「五四」時期的傳統。

1957年是新時代的第8個年頭，這段期間培養了兩屆大學生。學生右派的命運使他們無法成為今後中國各個領域中的主要力量，代之而起的則是那些在政治上始終沒有異議的大學生。這個事實提醒我們，要研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是不能繞過1957年的學生右派的（他們至少是一個參照系），因為當年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傳統正是靠他們延續下來。但40年後的結果是，具有獨立思考素質的大學生沒有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比如1957年北京大學「百花學社」的主要成員譚天榮、劉奇弟、龍英華、陳奉孝、張景中、葉於生、楊路、王國鄉、崔德甫、張元勛、沈澤宜等人，他們都消失在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中^⑭。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40年後中國知識界的主要力量，並不是由素質最好的學生構成的。

1958年7月林希翎被逮捕，後以反革命罪被判處15年徒刑，她當時24歲。

要研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是不能繞過1957年的學生右派的，因為當年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傳統正是靠他們延續下來。默爾戈德認為：不管是通過蘇聯的渠道或者是通過他們前輩的著作，他們仍然繼續了「五四」時期的傳統。

1973年刑滿釋放時，她已經37歲。1983年林希翎定居法國，她在1990年給國內一位朋友的信中說^⑩：

您知道我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儘管為了我的理想曾付出過那麼大那麼多慘重的代價，經過深重的苦難，但我至今仍是無悔和無愧。當年輕的聽眾給我遞條子問我這些年來在海外有哪些成就和成績時，我坦率地告訴大家：這11年來在名和利方面我是碌碌無為、無所收穫的，也可以說是個失敗者。既沒有出大作也沒有發大財。

林希翎的命運，映現了一個在封閉社會中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的全部人生。

註釋

- ①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40。
- ②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
- ③ 參閱《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上、下冊（廣州：人間書屋，1952）；《思想改造文選》，1-4冊（北京：光明日報社，1952）。
- ④ 葉篤義在〈我和張東蓀〉一文中說：「張東蓀解放後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我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他還是不寫，他說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參見《文史資料選輯》增刊，第2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頁65。
- ⑤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22。
- ⑥ 《竺可禎日記》，第3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頁322。
- ⑦⑧ 弦柱：〈中國最後一個右派〉，《傳記文學》（北京），1994年第10期。
- ⑨⑩⑪ 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第4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7），頁68；79；85。
- ⑩ 《批判右派份子林希翎等論文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頁52。
- ⑬ 汪子嵩：〈為甚麼青年學生會有右派思想〉，《思想戰線》，第3期（1957年7月18日），頁5。
- ⑭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67。
- ⑮ 北大鳴社編：《論墟》，第2期（1957年7月），頁35-48；北京大學浪淘沙社編：《浪淘沙》，第2期（1957年6月24日）。
- ⑯ 〈林希翎給本刊的信〉，《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2期，頁19。

謝 泳 生於1961年。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文專業畢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問題。